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14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专家学者把研究聚焦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来中央的最新精神和边疆民族地区实践上。对城乡一体化战略，在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新型城镇化将是我国今后几十年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也是促进民族地区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黄忠彩等专家，通过对武陵山民族地区6个县新型城镇化的实地调研，了解到改革开放以后武陵山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有了长足进展，当地政府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面对新的“四化”形势，武陵山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十分明显，主要是城镇规划无序滞后，产业发展先天不足，民族文化遗产任重道远，建设资金欲求无门，政策“洼地”严重失衡。根据以上情况，黄忠彩、田长栋、方清云提出了推进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5条建议：一是充分发挥政策优势，尽快消除“政策洼地”；二是大兴产业带动，避免演出“空城计”；三是拓宽筹资渠道，千方百计“筑巢引凤”；四是突出民族特色，坚守文化立城；五是建设步骤和建设模式必须因地制宜。这5条对策建议为推进武陵山民族地区及其他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把好了脉。

云南省委党校省情与政策研究所潘启云博士，结合云南边疆、民族、山区、欠发达的省情，在云南山地城镇化动力机制理论研究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是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产业非农

化是山地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二是打破体制机制藩篱，促进人口城镇化是山地城镇化的制度保障；三是合理规划城镇布局，实现土地集约化是山地城镇化的必然选择。认为构建产业多轮驱动、制度有效保障、土地集约配置的城镇化动力机制，探索“农民进城、城镇上山”的山地城镇化路径，必将能够为加快云南城镇化进程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

上海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黄玉捷认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是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社会融合是流动人口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流动人口洪流中的一小部分，在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中，是否与汉族流动人口存在差异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民族性在其社会融合过程中是否具有独特的推动或消融作用？在流动人口带家庭流动和长期居留的特征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家庭的生存和发展是否对民族性起到了坚持作用？上述问题是今天必须进行回答和论证。

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文献所研究员顾胜华提出，云南在城镇化进程中应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认为随着云南城镇化进程加快，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镇工作生活面临一系列困难，导致他们成为城镇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隐患，要解决这些问题与困难，必须在建立健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机构、实施更加特色的就业政策、强化城市民族关系的沟通协调、创新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化管理、制订特殊人群实施特殊的帮扶政策、推动包容性的城市社会人文环境建设、构建富有多元民族文化内涵的城市体系等七个方面着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心之博士，通过大量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对内蒙古、甘肃、云南等民族六省区城乡居民对外来劳动力态度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外来就业者必然给劳动力流入地居民带来不同类别的外部效应，而民族 6 省区城乡居民对外来劳动力不欢迎态度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而不是社会文化因素。

城市生态与环境保护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并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提到同等的高度，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必须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近年来，由于倡导绿色发展、低碳生活，各城市污染减排力度增大，城市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企业污染设施建设与管理水平均有较大幅度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有所改善，但是，也应看到，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仍然与广大公众的需求存在一定距离。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环境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宇军对全国 113 个重点城市进行了调研，在分析城市污染控制成效与进展的基础上，针对城市环境保护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认为城市环境保护应通过综合防治措施，逐渐向生态化转型，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公众生活质量。一要加大环保投入；二要严格控制机动车污染；三要垃圾管理从末端转向全过程；四要深入推进重金属污染控制；五要科学推进生态城市建设。同时，认为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必须树立生态城市的理念，协调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解决在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生态环境问题。

跨越式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的助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和某些区域开发的成功，一条共同的经验就是通过率先启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高速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云南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杜发春博士，在对新疆喀什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完成了《基础设施骨架与城市化建设：新疆喀什市调查报告》研究成果。成果对喀什的基础设施骨架与城市化建设的辩证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以“喀什经验”为启示，提出城市化动因是“因机遇而触发”，一由多元主体推动，二由外向型经济拉动的理论观点。他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应走生态城市化发展之路。为此，提出要构建发展生态城市化的战略体系：首先，从推进方式与策略上，依托生态产业发展建设生态城镇；其次，构建环境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涉及到大气污染防治、水资源管理、噪音防控、城市垃圾处理等方面；第三，生态城市化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相结合。

城市生态与生态旅游是近年来城市化发展中，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李宁博士，以国际视阈，从国外生态旅游的发展方式为借鉴，论证了乌鲁木齐生态旅游的生态旅游开发的必要性，分析了乌鲁木齐生态旅游的基础，认为重视生态旅游发展是构建乌鲁木齐和谐旅游的需要，也是建设乌鲁木齐生态和谐的要求，而加快与乌鲁木齐周边县市的生态旅游合作与开发，才能确保乌鲁木齐自然、经济与文化的和谐发展，保证乌鲁木齐生态旅游业的长远发展，而以乌鲁木齐县域的天山自然生态为中心、以天山境内的民族历史文化为核心的两种生态旅游资源共同构建了乌鲁木齐生态旅游的空间结构，保持这一结构优化，必须在生态旅游网络构建、多节点多极发展、生态旅游区域建设上下功夫。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结构优化与升级在地域空间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云南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李文荣等专家，针对云南山地城镇化本身存在的缺陷、因理解与执行新政中存在着各种偏差而产生的云南山地城镇化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和矛盾，提出必须对云南山地城镇化中存在的观

念冲突、潜在状况、面临的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冷静思考，认为基于云南实际，稳妥推进云南山地城镇化一定要注意几个方面：一是要准确把握云南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二是要做到“五个”协调，即与城镇规划相协调、与土地利用相协调、与农民进城相协调、与产业体系的协调、与人居环境相协调、与民族文化相协调。

城市化与信息化

2014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强调，必须统筹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它在农业现代化中起到“酵母”或“增强剂”的作用，已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手段、载体和核心内容，农村信息化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保障了其安全、高效推进。

云南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李文峰博士等学者，结合云南农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实际，阐述了农村信息化、农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农村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农业现代化是农村信息化的方向和动力，提出了云南省农村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的良好建议：第一，农村信息化建设应基于长远规划，以可持续发展模式和机制为前提；第二，立足现状，围绕需求分层逐步实施；第三，统筹规划、分层逐步实施；第四，资源整合、以政府为主导的多方协同推进；第五，突出特色、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互为动力。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地理系教授曹沪华、海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诚一等专家提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应该聚焦作为城镇弱势群体之一的城镇少数民族，大力加强城镇少数民族参与到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来，必须是今后政府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少数民族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参与到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到？他们论证了地理信息系统（PPGIS）与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联系，认为公众参与的地理信息系统（PPGIS），作为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空间数据参与管理系统，将为促进城镇少数民族参与新型城镇建设提供新的方法，同时 PPGIS 将在提高少数民

族融合程度方面发挥积极广泛的作用，应予以关注并推广。

云南农业大学周兵、李向东、周红三位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相关基本原理，联系我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结构特点，以“树结构”为体制构架的社会系统中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对城镇化进程中社会运行通道性能进行建模，对“树结构”与“果结构”社会运行通道性能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关于信息化与城镇化研究的理论观点，即信息化条件下多通道信息系统在城镇化进程中可以优化社会运行结构，促进体制变革，从而在城镇化进程中减少了社会的困惑和阵痛，并可大幅提升城镇化的效率。

社区减贫与新农村建设

改善民生，消除贫困是党和政府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我国已经在减贫和反贫困领域取得显著成就，贫困人口逐步减少，贫困村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与非贫困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贫困人口大多数集中在基层社区和农村。尽管如此，我们仍要继续努力，不断探索扶贫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小珉，以作为滇桂黔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贵州黔东南凯里市为研究个案，对进一步做好滇桂黔石漠化区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对策建议。第一，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努力改善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并与防灾避灾相结合；第二，针对不同的农户，分类指导、分类扶持；第三，扩大扶贫到户和扶贫到人的政策范围；第四，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加大以及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要继续加大扶贫资金规模，对项目进行追踪支持，并且在扶贫开发项目实施的过程中，给予项目地综合配套支持；第五，进一步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第六，加强贫困地区社会保障建设；第七，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协调城乡发展以及各农村乡镇之间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拉大带来的新的致贫作用。

新农村建设不是一个新概念，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曾多次使用过类似提法，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建设新农村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更加全面的要求。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任务之一，被形象地誉为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神来之笔，也是巩固减贫成果，防止返贫困的有效路径之一。

云南农业大学王国贤、李国治、李婧瑜、彭德远等学者认为，在实现跨越发展战略背景下，云南新农村建设必须重点做好以下

方面工作。一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信心加快发展；二要拓宽筹资渠道，整合资金投入；三要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四要紧扣总体目标要求，协调推进新农村建设；五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六要培育载体完善机制，激活农村发展要素。

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后面临的崭新课题，是时代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工业化有了一定发展基础之后都采取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战略。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已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根据国际经验，我国现在已经跨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因此，我国新农村建设重大战略性举措的实施正当其时。

云南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方文博士，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我国新农村建设进行了若干哲学思考，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语境下，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切实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准确把握多样性与整体性，做到因地制宜，科学处理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辩证关系。

云南农业大学工会副主席杨建荣，通过走访、座谈、实地考察、查阅文献资料等形式，以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辛街乡为研究个案，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状况作了专题调研。提出进一步加强农村组织建设，提高基层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大力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优化产业结构，做大支柱产业，做强特色产业；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创新农村组织形式，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是云南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之策。

城市老字号企业

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取得社会广泛认同，形成良好信誉的品牌。老字号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它的发展伴随着城市的成长，是一个城市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老字号因其丰厚的文化内涵为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带来了整体的积极效应。云南正大力发展旅游业，力求把旅游业建设成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柱产业，而老字号所具有的独特魅力的旅游文化资源正可以充实和拓展云南旅游业态和内容。“老字号”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的一个值得不断挖掘的宝藏。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所张继焦研究员提出，应从三个层次来分析“老字号”、“老商街”。第一个层次为微观地对老字号的分析；第二个层次为中观地对城市局部地区——老商街的研究，特别是对老字号集聚的老商街的分析；第三个层次为宏观地或整体地对城市竞争力进行分析，其中涉及城市竞争力与老字号、老商街的关系。“老字号”、“老商街”作为民族文化的承载体，是城市发展的动力，也体现了城市竞争力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越来越多的城市政府正在保护和开发一些老字号及其所在的老商街，并将其作为激活城市商业活力的方法的原因。而对于两者关系来说，“老字号”企业文化与老商街区域文化是相互协调的。“老字号”植根本地“老商街”就是立足本地、扎根本地，可以将自己的战略选择与“老商街”发展联系在一起。

云南省社科院图书馆副馆长李吉星提出，老字号、城市、旅游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历来是辩证的，就云南的特点而言，在城市建设、发展旅游的背景和机遇面前，可以借鉴其他地方的经验，通过老字号的文化旅游集约化开发，达到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

城市建设和企业发展的双赢。具体的做法是政府可以制定规划，积极建设特色商业街，一方面保护好原有的“老字号”，另一方面可将城区其它地方的“老字号”迁移到这些老字号相对集中的街区。商业街靠老字号扬名，老字号又可以凭借商业街的网点，集人缘地缘之优势，集中展示老字号丰富的文化内涵。既可以弘扬老字号品牌，也可为城市发展增添韵味，还可以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云南老字号“杨林肥酒”是一款百年历史的文化名酒，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丰富的地方文化内涵。云南是旅游大省，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杨林肥酒”作为云南地方特色产品应抓住机遇，不断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云南省社科院图书馆方婕博士认为，“杨林肥酒”要立足于自身丰富的历史文化，通过阐述历史渊源及产品的发展演变，结合云南旅游开发的优势，把“杨林肥酒”融入云南旅游市场，由通过与旅游相结合，扩大其知名度和影响力，进而增加产品市场份额；而通过发展旅游又能够把“杨林肥酒”的历史文化，保护和传承下来，其实这是一条促进云南地方特色产品不断发展的可行路径。

商业道德是现代企业、商业管理者和消费群体的“利器”，面对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商业行为的道德板块如何归位？面对新兴经济模式的推动，商业参与者的道德效益如何体现？

云南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青年学者路遥认为，重视财富、看重情谊、讲究分明、鼓励节俭、提倡思忧是云南传统文化的“财商”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就是传统商业道德的具体表现。云南老字号里蕴涵着丰富的商业道德元素，“坚韧、融合、敬畏、仁信”八个字表达了其本质内涵，它构成了云南传统商业道德的核心。在对待传统商业道德问题上，既要坚守弘扬传统，又要有所创新突破。以“坚韧、融合、敬畏、仁信”为核心的商业道德给我们的启示是，用精神引领行业，行业活力更持久；用文化影响消费，消费能力更持久；用信仰维护经济，经济发展更持久。立足云南的地理优势，继承云南人的“财商”观念，坚持滇商传统商业道德，树立突破创新精神，必将推动现代云南社会经济更好地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女性

城市化进程中的女性问题是值得人们关注和探讨的，其中少数民族女性更是得到高度重视。在城乡一体化语境下，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女性的就业问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女农民工健康问题、少数民族妇女宗教信仰中的伦理观念等诸多问题都是现实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近年来，云南的城市化发展迅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其中，女性失地农民在非农职业化选择过程中面临着重重困难，是急需帮助和引导的一类群体。

云南农业大学张慧博士认为，失地女性再就业的问题主要包括不能胜任市场需求、主动肄业思潮盛行、就业环境中的性别歧视、自主创业受限等四个方面，导致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跟不上、社会适应能力较弱、长期受落后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缺乏等。对此，需要从宏观层面在政策、服务、社会保障，信息提供方面给予落实，从中观层面，主要在社区管理上要充分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为失地女性搭建社会就业的平台，并建立起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从微观个体上改变传统思维观念，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完善自身。以此，走出就业的困局。

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女农民工的健康问题一直是女性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云南农业大学董海珍博士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社会经济生活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并深受其影响。其中大量的少数民族妇女离开家乡，进入城镇打工或从事经营活动以寻求新的经济机会，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了女农民工，并因此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要素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大多数女农民工进入城镇主要从事的是“苦、脏、累、差”的工作，因此

她们的健康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并成为制约女农民工发展的重要因素，进而也影响到了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要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关注女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与健康状况以及她们的社会性别观念、心理健康状况等。

云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王韵以宗教信仰文化为视角，研究了怒江傈僳族妇女宗教信仰中的伦理观念。认为，原始宗教信仰中的图腾和禁忌所规定的义务与责任，逐步形成了女性的责任就是守家和生殖，并以生育为重点，将女性的义务与责任限定在家庭范围内，不得参与其他的社会活动，而后来的基督教信仰中的教义教规对傈僳族妇女伦理观念影响很大。宗教礼仪和活动，不仅为傈僳族妇女提供了一个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而且也开启了她们的心智、提高了与人交往的能力，最终傈僳族女性道德观挣脱了原始宗教的束缚，又在基督教中找到了自己生存的空间。

都市村落与民族建筑

以提高农村土地的集约利用，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加快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村落空间格局优化成为人地关系研究的热点问题。村落是都市和农村社会的基本居住形式，是农村生产生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其选址、布局、规划和空间结构是否科学合理从根本上制约了都市与农村的人居环境条件。

新型城镇化对村落空间布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湘黔桂三省坡侗族聚居区村落空间布局形式、特点是依山就势、内聚向心、环水而居、沿线分布、界域分明。其不足之处在于空间布局不规整、建设用地不经济、基础设施不完善、环境治理难度大。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赵巧艳和桂林理工大学闫春基于空间优化的核心原理，提出应根据新型城镇化村落空间布局的观点，并阐述了进行内部改造、实施异地搬迁、定位优先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优化措施。

留住民族村寨守护都市记忆。无论是从留住城市历史，或是留住城市文化，贵阳在推进大都市建设进程中，应该在城市里保留一些或者两三个传统的苗族、布依族村寨。同时，也让离去家园的人们找到一条回归文化的路，有一个回望家园的地方。城市发展以后，应该有意识地去保护有关的遗存。贵阳曾经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在贵阳城中心区云岩区黔灵镇三桥村还保存着二桥苗寨，地处黔灵山公园后门，与黔灵湖相连，生态环境良好，城市的远古的文化历史与民族村寨有着紧密联系。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王炳忠学者认为，在当今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进程中，要开放与现代以坚守与传承的态度，留下非遗的载体——也就是中华民族根性文化的载体的一个个村落，

守住民族村寨能够守住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

当今，滥觞的国际主义建筑思潮，将中国城镇化裹挟在“普适化”中，使得中国的城镇化“价值判断失衡、跨文化对话失语、体制和制度建设失范”。中国西部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人文历史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形成了当地民居的独有的生态建筑文化。

云南农业大学周兵、李向东、周红提出，应立足代表我国民居典范的西部民族民居，透析其民居中蕴涵的生态建筑文化及其传承价值，并据此探讨创建西部特色魅力村镇的意义；由此探究在当今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与资源有限、人居环境恶化的形势下，创建西部魅力村镇的关键在于加强技术研讨，不断推陈出新，以强化特色为重点大力提升民居保护水平；强化民居营销，创建并打造西部魅力村镇驰名品牌；乡村示范，城乡并举、城乡互哺并建立多方投融资、受益机制；从产业扶起，大配套、小干预，抓大放小；从引导做起，点面结合实施示范工程；加强农村文化生态立法等。

城镇化与民族文化保护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和宝贵资源。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对保护意识，致使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负影响相当大，造成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流失，少数民族原有的价值观念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遭到很大毁坏。开发中，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和约束，民族文化往往更多地被商业庸俗化。

云南民族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杨国才教授认为，古老的村落往往都保留了众多的古代民居建筑、宗教建筑以及相关的文化遗存，都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对这些历史文化进行分析、规划、保护十分必要。发展生态旅游是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经济建设的有机结合点。所以，在项目的选择上，必须是与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当地群众有一定技能基础的，在短期内即有经济回报的项目。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应有相应的措施作保障，使之能达到既保护又利用的最佳效果。

随着新一轮城镇化高潮的来临，将会有更多的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移居到都市或城镇。面对这一变化和趋势，中国民族研究的重点区域必定面临着从乡村向城镇的转移，至少必须建构城乡兼顾的格局，同时，所探讨的问题和聚集的焦点也随之需要重新定位，以往的理论、观点和未经论证的“先见”需置于新的场景下重新审视与探讨。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族群边界成为国际人类学讨论的核心范畴之一。以往的文化人类学理论通常将文化接触与文化涵化或文化同化之间预设为因果关系，中国的民族研究习惯性地用人口流动、文化传播和城市化解释民族文化多样性消失的根源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危机来源；族群边界样态的多

样性问题和在族群互动过程中，主流群体与边缘群体在经济、政治及权力的差异所形成双方对族群边界建构所发挥的作用的不同，这两个问题往往未能被他们关注到。

云南大学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何明教授，以从贵州农村迁徙到昆明从事垃圾回收职业并聚族而居的布依族为研究对象，解析族群边界的建构过程，指出，布依族与城市居民的接触并未导致文化同化，反而进一步凸显了族性并建构起刚性的族群边界，其动力来自族群之间的互动，而拥有经济和权力强势的城市主流群体对作为边缘群体的少数民族的社会排斥为其主导作用。由此，对人类学研究的相关问题用自己的创新观点进行了回答：文化接触并非必然导致文化差异性的消失或文化同化，由城市化形成的人口流动并不意味着族群边界的模糊与消失；族群边界的存在样态多样，构成因素复杂，表达的强弱或显隐程度各不相同；族群边界并非由某一族群孤立地自我建构而成，而是该族群与其他相邻族群互动的结果。

近年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各种少数民族文化日益受到冲击，少数民族许多节庆的原生性受到挑战。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在云南边疆地区，许多民族的传统节庆开始逐渐消亡，传统节庆文化已经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不再浓厚，一些得以保留的传统节日也在文化内涵、形态和形式等方面发生了较大改变。

云南民族大学马伊博士认为，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要处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系，探索城镇化与文化保护规律，利用各种优势资源，深化对少数民族地区传统节庆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了科学系统的阐述，为区县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云南省作为集边疆、山区、农业、民族为一体的省份，少数民族独特的民风民俗文化会由于城镇化进程而发生改变甚至消失，如何保留他们民族中的文化精华，又使得他们能够融入城镇化生活

将是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云南农业大学龙蔚、王全春认为，社区文化的变化既是社区发展的结果，又是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结合村民的心愿和当前农村文化生活实际，农村文化建设和改进农民文化生活现状的主要着力点在于不断拓展农村文化活动场所，发挥农村基层组织在推进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加快农村文化体制改革和农村文化产业建设。

云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王迪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根系，是一个民族生存、延续、发展的重要支柱；城镇化是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必经过程。城镇化对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是一把“双刃剑”。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成与保持受到城镇化的严重威胁，城镇化加剧了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城镇化促进了民族文化的普同化。为此，要对民族文化按“分类分层”的保护原则进行保护，要把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纳入城镇化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发挥教育和舆论的导向作用，增强民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大胆扬弃、积极创新、加快发展，让民族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大放异彩。

社会治理和社区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深刻领会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功能定位，坚守新时期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价值目标，诊断目前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面临的现实困境，探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的实施策略。在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突出的条件下，加快福利社会建设是应对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途径，也是促进社会认同、重塑价值共同性的重要途径，将为社会建设与中华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免平清博士认为，在当前对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反思与批判中，有不少人将西方国家危机归因于福利制度，并认为中国应该吸取其教训以防范“福利病”。对这种论调与分析，我们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根据西方福利制度发展的历史与实践，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厘清认识上的误区，形成行动的共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福利社会建设模式。建设福利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的。在当前和未来，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以民生为重点，就是要加强社会福利建设；加强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主的福利社会建设，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口。

全面深化改革的最终落脚点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保护“五位一体”的国家治理框架中，将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稳

定、有序、和谐与活力兼具的幸福生活，核心要素就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关键是理清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和社会公众的责权利。

中央财经大学方舒博士提出，我国今后应该主要从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建设和谐社区以及创建和谐企业三方面着手创新社会治理。社会政策作为现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治理行为，始终围绕社会稳定和民生福祉等核心内容，与社会治理具有目标一致性，因此推动中国社会政策发展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着力点。具体说来，推进上述三项工作都将为我国社会政策今后的改革与创新营建全新空间、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社会政策只是顺应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议题不断创新，才能逐渐提高科学化水平。科学合理的社会政策未来亦可称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以来，城乡一体化进程在日新月异地加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以往城乡发展过程中，缺乏城乡之间的互动机制，农村的发展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伴随该过程的是耕地减少、农业生产污染严重、农村环境破坏、生态恶化、产生大量失地农民、小农户生存空间被压缩等，这又进一步引起了新的农村问题。

云南农业大学青年学者冯彦敏、赵海波认为，要解决好三农问题，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需要建立起城乡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城乡发展互相促进、和谐共赢，而 CSA 为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CSA 要求在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互助合作关系，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采用有机生产，提供绿色安全食品，支持小农户的生产，支持本地经济。CSA 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作用主要有城市支持农业生产，农民生计得到保障；满足城市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迫切需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农业，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有利于市民和农民之间的平等交流沟通，推动城乡和谐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